

□ 理论探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 底层叙事

姜春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彻底颠覆了此前的文学传统与书写经验,以其鲜明的指向和姿态,形成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体现了强烈的底层关怀与底层叙事精神,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规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底层文学书写,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讲话》具有鲜明的底层价值取向

文学价值取向涉及话语领导权问题,决定着文学的归宿,是文学价值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文学作品由谁来写、写给谁看、怎样来写?是站在上层社会、知识精英的立场,还是站在底层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书写?最终又是为谁服务?其结果和面貌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在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上,中国古代及近代主流文学,其创作目标或者说接受对象,基本上都是指向上流社会。古代有“缘情”的文学、有“载道”的文学,其所“载”之“道”,是统治阶级的驭人之“道”,所“缘”之“情”,是封建贵族和士大夫官场失意的牢骚之“情”或恣情山水时的娱乐之“情”,“广大穷

苦的劳动者是无法进入文学创造和表现的领域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大都离劳动者的生活太远,再加上,广大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学只能是游离于他们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①这一状况在《讲话》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亦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③《讲话》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④我们的文学艺术主要是为“工农兵群众”的,^⑤文艺为底层人民大众服务,是《讲话》的精神实质,蕴含着《讲话》的价值指向,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此前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使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转移。《讲话》中阐述的文艺创作的主客体问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等诸多问题都是以这种底层价值取向为共同旨归。《讲话》以鲜明的姿态昭示我们,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底层,如果没有底层的根基,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发展

起来,如果与普通大众没什么关系,而只是为少数中上层人群服务,那也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我们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近年来,作为文艺界的一股创作热潮,底层叙事受到了很大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叙事可以称为时代的镜子和社会的映像。一些作品抓住了社会变革期间底层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命运的起伏,对这种生活状态和命运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社会价值。对于当下的底层文学而言,就是要建立起民族的主体性和底层的主体性,若没有主体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就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别种话语所笼罩。底层文学“只有对权力和荣誉、甚至表面看来最权威的法兰西学士院以至诺贝尔奖采取漠然态度,与当权者及其价值观保持距离,才能得到理解甚至尊敬,并因此得到回报”。^⑥这样才能产生底层文学的审美眼光与独立准则,才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具有底层文学价值取向的文学场。

二、《讲话》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大众立场

文学创作主体问题与文学价值论关系紧密,主要牵涉文学创作主体的态度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为谁写、怎样写的问题。这一关系影响文学创作的过程,并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创作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因素来设定自己和书写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设定自身相对于书写对象是什么角色和身份,在情感上是亲近还是疏远,在精神层次上是高是低,这样的设定也就预示了创作者书写的不同立场。

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历程,这一问题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运动,都是围绕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

中心进行的。由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左翼作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清楚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面对书写对象的立场和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在这一问题上,《讲话》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大众立场。《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底层的工农兵群众,并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⑦针对当时解放区文艺界存在的脱离群众、轻视实践等不良创作风气以及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⑧要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言人,要书写出人民群众的奋斗历史,而不能做空头文艺家。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⑨在文艺为大众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区文学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创作了大量从内容到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来自底层的人民大众成了作品的主人公,他们走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用忘我的劳动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

当然,不可否认,今天的叙述语境和解放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底层”依然存在,而且规模庞大。今天被叙说的底层主要集中在农民、进城务工者、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许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中是“没有底层民众的位置的,一切都以国家建设和

经济发展为中心……对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无论是农村作家还是城市作家都把改革当成一切问题的解决良药,一切新问题都被看成‘现代化’程度不够的结果,这样,在改革中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一直被忽视”。^⑩近年来,一些创作者已经注意到在“底层经验”中包含着巨大的创作资源,但对这个资源的开掘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深度。一些作家虽然描写底层,但并不具有“底层视角”,实际上并不关心底层生活的现状,而只是想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其姿态是俯视而非平视。底层文学需要强化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文学领域从长期的个人化叙事、欲望写作中解放出来。

三、《讲话》确立了 接受之维的人民性

文学接受方面的问题与文学创作主体论紧密相连,是《讲话》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具体表现为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讲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分析不妨与20世纪中期兴起的接受美学进行比较,这可以看出其质的区别。“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者对象是模糊、不具体、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明确的身份限制。”^⑪这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方向转折。因为,“如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⑫而这一问题在《讲话》发表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即便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始终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

立,使得文学活动中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对象发生迁移,使文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和转折,文艺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人民自己需要而且从此也能得到满足的精神工具,“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⑬文学家们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目标,“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⑭《讲话》接受之维的人民性的确立深刻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作用于人民群众的情感及精神层级的文学艺术,通过塑造人、使其成为历史转变时期巨大的政治推动力量,进而实现其改造世界之目的。这给底层文学创作的启示是:不仅要描写底层,还要学会“塑造”底层,要将人民性与艺术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人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涉及到底层写作与现实的审美距离问题。一些底层写作与现实之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使底层叙事出现了概念化和雷同化、情节模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作家在底层叙事中所产生的道德化倾向、把作为对象的“底层”绝对化和神圣化、将苦难审美化的倾向,往往影响着此类小说精神域地的广度和思想掘进的深度,如“打工文学”、“下岗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少作家在表现底层现实时,“苦难”和“绝望”成为他们言说的普遍方式,他们往往带着痛楚的苦难经验与强烈的倾诉欲望叙述底层,建构了一种苦难的审美情境,显露出某种“肤浅”和功利,因而使得小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刻意”的姿态和“观念先行”的倾向。这当然也就很难生动地表现和书写人民性。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将人民性与艺术性很好地统一,才能创作出更多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作品。

四、《讲话》坚持 群众利益至上的批判现实主义

《讲话》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出群众利益至上的立场。《讲话》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再现生活与批判现实,表达对普通人民群众命运与前途的关心与同情,倡导文艺创作要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既具有社会批判的强度,又能显示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并能上升到人类文化哲学的高度。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必然能够使人民群众受到启迪和教益,唤起消除负面影响和不良倾向的愿望和意志。

《讲话》认为文艺批评态度是“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样政治态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艺术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①对于文学创作如何进行“歌颂”与“暴露”如何表现“人性”,《讲话》同样表达了人民大众至上的批判立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当然,“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艺术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②《讲话》始终把普通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正是其至今仍散发着光辉的重要原因,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底层文学

创作可以从中悟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真谛。

从批判现实主义的外在形态和表现手法来说,它应该是底层叙事的天然盟友。从底层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关注底层必然要对底层的对立面和底层自身的问题进行现实主义的考察与批判。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底层的关注与对现实的批判却不断减弱,有的甚至模糊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限,一些作家进行所谓“私人写作”、“零度写作”、“商业写作”甚至“身体写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心里、眼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群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存在,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怎么能让人民群众满意呢?”^③这样,文学也就逐渐丧失了读者。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对底层的关注越来越多,底层文学创作呈现繁荣气象,令读者重新感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事实证明,当文学关注底层、关注大众时,文学就回到人民的怀抱;当文学削弱了它的底层叙事精神和批判现实精神时,文学也就失去了人民。□

①①张清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史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1期。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⑬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857、853、856、851、860—861、857、868—869、871—8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第7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⑪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⑫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37页,光华书店1948年版。

⑬⑭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第10、1页,新华书店1949年版。

⑮董学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求是》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